

何平、宋昕玥、邱玉洁、张瑞洪、宋毅菲、邱楚译等6人正在讨论中



朱婧：“希望那微弱的声响在此时能被听见”



朱婧

事,也能用克制的调子展现,不过尽管克制,却有明显的个人色彩。具有文学气质的女性的爱情、婚姻和家庭生活,是她探索的重点,她用语言精巧疏离,能看出曾经“萌芽”作家的特点,甚至可窥见日本私小说的风味。

邱玉洁:朱婧细小的描述中蕴含着执拗的力量,这种执拗在她的文本世界意味着一种赖以生存的信念。正因为细小,不易为人所察觉,甚至不会造成威胁,所以这是一种不伤筋动骨也无伤大雅的执拗。但也同样因为微不足道,于是退守为方寸间一块内心的自留地,保持表面的沉默与恭顺,其中的意志不是旁人可以轻易转移的。这是朱婧笔下困于尘世的人用以抵抗世界,向内获取自由的方式。《我的太太变成了鼠妇》中,妻子看似在日常的家庭生活中实现了自我驯化,顺着丈夫的心意,把自己培养成一个“理想的妻子”,却在“他不知道的地方长大,也许身陷更深的幽暗”,曾经的生命能量被压抑,“残留的部分”变成了“幽暗的气团四处奔走”。不断累积的物品摆满那间从未打开的储藏室,暗地里的发泄也是她对自己身份的反抗。我很喜欢鼠妇这个比喻,坚硬的外壳可以抵御外界,内心孕育着力量却藏身于暗处,静默地存在那里,不会给他人带来困扰和伤害。《那只狗它要去安徽》中也有同样的表述:“我们是最平凡的人,我们都不是因为勇敢无畏来获得生活的嘉赏,我们都小心翼翼地生活以避免异类,我们所有的不过是一点坚持,直觉告诉我们的坚持。”

张瑞洪:朱婧不厌其烦地写生活琐事,她将日常的种种琐碎当作可以为文章带来隐喻的道具,在柴米油盐的向上度,作者坚持非集中化的原则,不断从家务中提炼“女性的世界在家庭之中”的观点。朱婧做得更多的是“下潜”,即到日常生活的变数之中,用她绵密的句法和遣词造句,带我们进入情感关系的不易察觉之处。对于短篇小说来说,过分地悬而未决会让我们无所适从,究竟是什么在推动故事?虽然“细节是高端的技巧”,但迷恋细节容易让一篇小说变成私人经验的组装,从而失去精确度。

关于沉默、软弱与断裂

宋毅菲:相对于一些作者在书写日常生活这一“小历史”时过度关注激烈嘶吼的人性,朱婧笔下的人性则显得哑忍,要沉默许多。其作品中无论是游离于不同爱情的年轻女孩,如《关于药,关于爱》中的小鱼和《青炎》中的苏小玉,还是沉溺在琐碎家务和难以言喻的夫妻关系中的家庭主妇,如《危险的妻子》中的梨花和《我的太太变成了鼠妇》中的太太,都携带着一份“闺秀式”的纯净、易碎、克制。由于她们的清醒、敏锐和不知何处出现却仿佛生来有之的坚韧,那一份隐忍便成了动态,一切内在和外在的力量都推动、预示着这些女性的蓄势。朱婧经常停笔在

对压抑痛苦现实的隐忍上,就像《猫选中的人》结尾:“看起来那么乖巧,它们既不会要求,也不会抱怨,以为这逼仄、饥饿和匮乏是世间平常的事”,但我们都心知肚明,哑声不是终章。我们害怕并期待着隐藏在背面的声音,那是气体在狭小、密封的容器中逐渐膨胀终至炸裂的轰鸣,及炸裂之前那嘶嘶的细微声响。

邱玉洁:恭顺沉默却又坚韧,这样复杂的缠绕大多集中在朱婧笔下那些“软弱的人”身上。对照其间,似乎我们也可以看到自身。“软弱”在朱婧的作品中并不是弱者的标签,它是每个人心中不可随便示人的幽暗之所,可能只闪现在一刹,也可能预示一种恒久的困境。朱婧的作品很多在探讨一种正常与异类的对峙,软弱则是悬于两者之间的一种尴尬,抑或是一种“歧路”的暧昧。很多人物终身徘徊于两者之间,经年累积,郁结成一种心疾。但正如加利亚尼所言,重要的不是一种,而是与之共存。正因为有了意识和自我审视,人才会在隐秘的裂缝处滋生异端的情愫,这样的时刻包含自省的意味,也同样藏着细密的慈悲与宽容的道德。幸运的是,在朱婧笔下,所有人都能够被原谅,最终让生命自行其是。

张瑞洪:求学、工作、嫁人、生育、抚养……这是朱婧作品里基本的叙事母题。看似顺滑安稳的日常实际上充满了断裂,她借多人之口表达了同样的意思:“挣扎无益,便不挣扎,执着也是徒然,于是舍弃”。这容易叫人联想到日本文学的自弃感,如谷崎润一郎用暴力催生美的极致《刺青》或村田沙耶香用怪诞对抗冷淡的日常《生命式》,而朱婧则沉迷在“生活展露的细小破绽处”,既无力克服,又难免重现。笛安的说法很准确:“朱婧写的都是无用的人,失落的人,在人群里安静无声的人,以及被打败的人。他们试图维护一点尊严,或以沉默的方式,或以种种不得体的举动。”

关于家庭内部的结构

张瑞洪:朱婧在2003年发表的小说《黑洞》中借一个童话写道:“这个孩子,她一辈子无法进入普通女人的幸福。”20年已过,早年间对女性形象隐秘心理的发掘确立了作家日后的主题——对“家务事、儿女情”的崇拜。

2019年朱婧出版的集子《譬若檐滴》属于对10年前写作姿态的延续,同名小说延续早年《人生若只如初见》的古典式感伤情调,写叙述者对单身母亲私人生活的目击;但不同的是,在《人生若只如初见》里,作者构建出庄子夫妻与惠子间的三角关系,直至结尾也没能为在冷暴力中死去的主妻奋起呐喊,青春时期的写作让朱婧在那一次故事新编中把悲剧写得无可挽回,庄子在妻子死后以鼓为乐的典故于是有了合法性的嫌疑,这种伤痛式的写法值得玩味。也许20年

的生活令作家本人真正涉入家庭事务中,导致归来之作褪去了无意义的疼痛,同时又能继续聚焦女性经验的隐秘处,并一一显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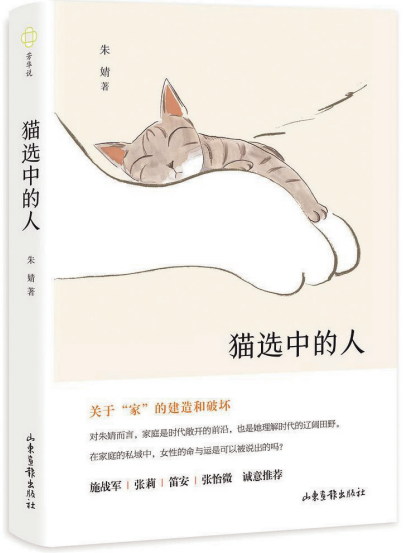
邱楚译:朱婧的新作仍延续了她之前的写作视角,但在意蕴表达、人性挖掘等层面略有不同。相较于隐喻话语意识权利的母性书写,她的创作显然带有现代语境的反思,尤其是生发于自身的镜像联结和精神投射,为当下讨论母性书写提供了新的视角。朱婧在很多作品中都设置了“母亲的缺席”这一背景因素,例如在《猫选中的人》中,母亲在主角的人生中始终扮演着碎片化的角色,直到她离世,他心中的怨恨才剖白为一种遗憾。《细路秘径》中,水清父母过度参与女儿的成长,使母性不断异化,造成水清想象的缺失和变形,于是她只能将期望投射到“他者”身上,以达成“救赎”。《我的太太变成了鼠妇》则暗含一个救赎失败的案例,妻子是一个在丈夫面前过度克制的女性,努力扮演家庭中的母性角色,牺牲、妥协、自我塑造不断强化了她身上的母性,但丈夫的背叛、两次流产将她的情绪耗为背部的淡色瘢痕与偶然的神经痛,部分母性的无处安放显然对她造成了精神性的伤害,凝为脸上“圣母像一般的哀伤”,加速了她的异化,也加深了夫妻间的区隔。母性书写作为讨论场域,安置了人物的缺失、错置,用转移、异化的形式达成了救赎,供养着沉浮在无常世事中的不安灵魂。

宋欣玥:朱婧近几年的短篇小说,无论叙述者是男是女,背后经常出现一条隐秘的女性情感暗线:一些女人慢慢陷入家庭生活编织的巨网,被父权规训;但若把诸多故事拼接起来,似乎能看出她们日渐推进的反抗路径。《危险的妻子》中,“我”每日乐此不疲料理家务,倾听梨花的丈夫明目张胆的出轨史,却似乎有意忽略了自己丈夫的冷漠。“我”和梨花究竟谁才是危险的妻子?《我的太太变成了鼠妇》里,无名无姓的太太是被“我”精心磨制的艺术品,“我”赡养她,消解她的自由,把她从活力少女变成美丽无用的摆件。与此同时,太太用她的方式慢慢背离“我”,以无边的幽暗封闭自己。“我”曾经热爱鼠妇,隐喻“我”享受操纵太太的快乐,太太变成鼠妇后,“我能感觉到围城在微微震颤”,因为太太像花盆底下的鼠妇做出了超出“我”掌控的举动,“我”怨恨、畏惧又展现出虚伪的无能。可是从另一角度看,太太变成鼠妇,是女性为独立做出的微小改变,虽然柔弱和顺从,但却隐藏着另一种不惧消耗的剑拔弩张,这或许是绝望的反抗。

关于写作的态度

张瑞洪:朱婧写校园生活、家庭关系、情感悬念,看似细小,却无一不是作家从生活中发现的真实。她没有介入宏大历史的野心,更多是对现实的关注。《水中的奥菲莉亚》中,朱婧书写一

对读层读书会由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何平发起,通常以一部作品为楔子,围绕某一主题由此放开说去,不限于单一的作品本身。一般讨论成果会整理发表于公众号“送你一朵花戴”,公众号后续会开放评论区留言功能。对读层是大气层的最底层,其中生成的每一阵风、每一滴雨都与大地上的人们息息相关,一如文学。



猫选中的人

何平(主持人语):朱婧在《譬若檐滴》后记中说:“希望那微弱的声响在此时能被听见。”朱婧写冷漠麻木的眼睛看不到的东西,绝大部分是一种“看起来没有那么值得写的人生”(古尔纳语)。而在这样的庸常之下,她的笔端始终萦绕在一些意识的瞬间和自我俯瞰的时刻。循规蹈矩的生活中暗藏的潜流和裂缝,随着觉醒慢慢浮出,直至无法掩盖,像一道结让人再也无法忽略。本期读书会,我们共读了朱婧的新书《猫选中的人》及她的其他小说。

关于细小与微弱

宋昕玥:在我看来,朱婧的文章拒绝直露,情绪如同将化未化的冰层下隐隐流动的水波,从产生到激起层层涟漪需要时间传导。她的小说多聚焦现代人生活中微小的心理波澜及秘不示人的情绪变化,即便是生活中轰轰烈烈的大

王怀昭、刘可、顾萌萌、朱乃欣、宫铭杉、罗涵语、杨淑芬等7人正在讨论中

撩开毛姆小说世界的“面纱”

王怀昭(主持人语):今天我们讨论英国作家毛姆的小说《面纱》。这本小说创作于1925年,讲述关于爱与责任、人性与救赎的故事。毛姆以冷峻深刻的笔调,在异域时空的转换里,将幽暗与光明的人性褶皱一一撩开,并进一步探讨人的精神在何处栖居的问题。时隔100多年,这本小说今天读来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借由这本小说的讨论,我们撩开的不仅是毛姆小说世界的面纱,更是现实生活的面纱。

刘可:传递出关于女性生命哲学的思考

《面纱》书写女性的个体觉醒、自我追寻,其中女主人公有着鲜明的性别身份,因此可以认为这是一部女性成长小说。毛姆聚焦于女性人物,以抽离又清醒的笔触书写凯蒂的心路历程。当她跋涉而来,内心最终丰盈,“她感到自己内心充满了力量,能够抱着乐观、轻松的心态,去勇敢地面对将要到来的一切”。从最开始在情感与物质上双重依附于他人,没有主体意识,到经历瘟疫和生死的考验,最终自我觉醒,主动掌控自己的生活,勇敢地面对未知的一切,凯蒂的成长经历是自我意识从空缺、苏醒再到确立的过程。这一书写不仅是作者人道主义理念的展现,更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超前于毛姆所处时代的觉醒之音,传递出毛姆对生命哲学的思考:正是在奋斗与克服中,探索通往自由的路。真正的生活绝不是依附他人、纵情声色、享受欲望,而是勇敢坚强地承担生活的伤痛,寻找与走上属于自己的人生之路,在真正有意义的生活中心奉献生命与精力,有尊严地屹立于世。

顾萌萌:呈现出对背离道德感的怜悯之情

毛姆对人性幽暗曲折的探析总是如此犀利精明,常常解构那些习以为常的人伦关系,又呈现出一种对背离道德感的怜悯之情。或许毛姆想探讨的是道德对人的束缚,道德是否有着反人性的问题。毛姆在小说中为人的委屈和卑鄙寻找出口,每一次读都像一次心灵的解脱和人性的审判。

沃尔特在临死前说:“死的那个是狗”,这是哥德史密斯在《挽歌》中的一句诗,大意是:好心人收留了一条狗,后来人狗反目,疯狗将人咬伤,大家都认为这位好心人会死掉,但最后死的却是狗。毛姆在此引用这句话想表达人性的转变,究竟谁是人,谁是狗?人人都以为死去的会是凯蒂,然而却是沃尔特。一开始,凯蒂出轨中伤了沃尔特,这时的凯蒂是狗,沃尔特是人。之后,沃尔特胁迫凯蒂

去涠潭府,产生了让凯蒂在霍乱和自己的伪善中死去的念头,然后他看到本性粗俗的凯蒂在霍乱横行的环境中变得友善和独立,意识到了自己因爱而生的卑鄙、伪善。这时沃尔特变成了狗,他痛咬了凯蒂,而凯蒂则变成了一个好人。毛姆将高尚与卑鄙、善良与恶毒、明朗与阴暗、热爱与仇恨并存在一人身上,让人物在爱与恨、善与恶之间备受煎熬。

朱乃欣:带有典型的“东方想象”色彩

我想从“面纱”意象谈起,讨论人如何获得内心的安定。“面纱”的意象在小说中有诸多表现:偷情房间里的百叶窗,抽烟时产生的烟雾,自然的雾气对景物的遮蔽等,这些意象都体现了对视线、对事物的遮挡与对事物的掩饰。注视与审视是文中的核心动作,许多角色的魅力在于他们的眼睛。人际间多重注视与窥探的反复,在每个人物的脸上套上了有如面纱的牢笼。小说通过女主角凯蒂的心灵成长,将心灵安定如何实现的答案引向了关于内与外、爱与责任的讨论,几乎每个小说人物都深陷于如何平衡爱与责任的难题。透过人性的幽暗百态,《面纱》显现出一种宝贵的人生智慧:自我的安定是爱与责任的稳定结合。这是一个很有感染力的主题,也是《面纱》被多次改编、长久地成为人们讨论热点的重要原因。

宫铭杉:改编影片失却小说深刻冷峻的叙事质感

《面纱》2006年时曾被拍成电影搬上大银幕。虽然电影同样展现出救赎、觉醒与凯蒂最终走向安宁之路的主旨,但对小说的人物、情节、环境都进行了改动。在电影中,故事发生的地点不是香港,而是上海;故事走向也增添了很多小说里没有的细节,比如凯蒂和沃尔特不再是单向的爱与被爱的关系。在霍乱时期日复一日的相处中,凯蒂逐渐爱上了沃尔特。也许有人更喜欢电影和舒缓的叙事语调以及对爱与宽恕的浪漫表达,但我认为电影的改编恰恰伤害了毛姆在表现小说主旨时的可贵之处,即以冷峻深刻的旁观视角描写人性的复杂与生活的真实。

毛姆是怎样引领凯蒂走上安宁之路的?确实是通过爱。但与电影中对两性之爱的单一理解不同,《面纱》实际上描写了凯蒂对3种不同类型的爱的体悟:一是最浅显的男女之爱,这一类型的爱通过多组人物形象展现出差异;二是宗教之爱,即

教徒对世人的仁爱与怜悯之心。在凯蒂眼里,这种爱是有距离的“神者”之爱;三是亲缘之爱,主要表现在凯蒂和家人之间。如果说电影阐释天灾下的道德说教,凯蒂应该通过爱上沃尔特而获得“道”,那么小说则是凯蒂自灵魂深处的觉醒习得了追求“道”的方法,而非直接获得“道”。“失之毫厘”的人物形象和小说情节,使影片与毛姆的写作初衷“谬之千里”了。

罗涵语:以瘟疫地区的治理影射人性救赎的主题

沃尔特和凯蒂的婚姻是一种狗和人的关系,沃尔特明明知道凯蒂不喜欢自己,却还是百般讨好,只要拥有就足够了。遭到背叛后,他选择和凯蒂前往霍乱发生之地。与其说沃尔特和凯蒂进入了瘟疫地区,不如说他们进入的是自己的内心。两人的内心都有极为严重的心病,霍乱是否能够拯救自己才是他们面对的真正问题。与此同时,人开始改变,慢慢地向狗示好。凯蒂逐渐走出被查理背叛的痛苦,一个偶然的机会她到修道院,发现沃尔特是一个受人尊敬爱戴的人,也看到了他对修道院的援助。我觉得修道院这一场所承载着救赎的意义,但毛姆不愿将救赎归向宗教,而将修道院的宗教色彩进行了削弱。同样地,对凯蒂来说,减轻沃尔特的痛苦是一种补偿,这种补偿也让她深感灵魂得到救赎。狗终究受不了煎熬,走向了自我毁灭,而人终获自由。凯蒂只是恰巧不喜欢那个人罢了,她最后也认为她的人生不应该为了名利和男人生活,而是应该学会爱与被爱,找到真正的自我。有了自由,她也就有了无所畏惧地从容面对未来的勇气。

杨淑芬:爱与救赎的探讨

在我看来,《面纱》讲述的是爱与救赎的故事。小说从情感的视角切入,先讲凯蒂、沃尔特和查理三人之间爱情的博弈、背叛与沦陷,但随着故事情节的推进,不难发现毛姆要叙述的其实是人性的救赎。凯蒂由浅薄轻浮的中产阶级少女成长为一位具有独立意识的女性,与其说揭开面纱以后,生活的磨难催发了她的精神成长,不如说这得益于人物的自我救赎。在情场失利后,凯蒂跟随沃尔特北上涠潭府,主动融入修道院的工作,并收获前所未有的幸福。在此,凯蒂焕发出新的活力,对亲密关系和人生都有了崭新的认识。谈谐乐观且深受



电影《面纱》剧照

中华文化观念影响的沃顿,帮助凯蒂重新认识生活的本质,又让她重新认识中国和中国人。然而,凯蒂的爱与救赎最终没能顺利完成。沃尔特离世后,她回到香港,再次掉入查理温柔的情爱陷阱,沦为欲望的奴隶。她选择再次逃离,回到英国。经过诸多生活的苦难,凯蒂与父亲达成和解,一起生活。

凯蒂虽然并非被言说的客体,但她属于被救赎的一方。小说沾染了中国百鬼的愚昧、迷信和庸俗,以此反衬西方社会表面上的先进与优越。毛姆也有意解构了西方中心主义观念,为此他塑造了性格复杂的细菌学家沃尔特。沃尔特为了惩罚不忠的妻子选择了支援疫区,后在痛苦与心碎中主动牺牲,这种安排无疑是毛姆对西方中心主义立场的批判和讽刺。

王怀昭:爱你的责任,是化解一切悲剧的答案

我认为,“面纱”意象在小说中不只是空间之间的区隔,比如凯蒂关于雾中寺庙的奇异观照;或是人给自己戴上的虚妄假面,比如沃尔特在凯蒂面前的看似真切实则自私的表白,更是介于人性善良与邪恶之间的模糊界限,是人在肉欲与灵魂之间不断挣扎的表征。借由凯蒂婚内出轨、沃尔特伺机报复、查理推卸责任的故事,毛姆写出了一篇关于生命救赎的真相:爱你的责任,是化解一切悲剧的答案。毛姆塑造了一位出身英国贵族,为了远方的人们甘于放弃世俗繁华、投身医疗及儿童福利事业的修道院院长,来承载他对真善美的理解。也恰恰借由修道院院长和修女们的关爱及在修道院的工作经历,凯蒂得以用另一种眼光看待她和沃尔特、查理的关系,并重新理解这个世界。在她们之间,一个生命影响另一个生命是切实存在的。不过,毛姆显然对宗教的救赎力量存有相当程度的怀疑,这也是凯蒂无法深层次理解修道院院长

青蓝读书会 logo
www.chinawriter.com.cn
本专刊与中国作家协会办

青蓝读书会于2020年9月正式成立,由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郭冰茹倡议发起,带领硕士、博士研究生每月阅读一本当代有影响力的、新锐的小说,并深入讨论。书籍深富,辞理逗逗。皓如江海,郁若昆邱。欲青出于蓝,唯求新意而发心声。

面纱 The Painted Veil
毛姆著 张明译